



四川省劳动密集型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基于 2006—2019 年的数据

徐万刚

摘要:在新技术革命浪潮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何去何从成为学术界亟待深入研究的时代课题。基于 2006—2019 年四川省制造业的相关数据,以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为依据,从四川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型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出发,提出按照科学分类、分层推进的思路,在“承接转移”和“空间布局”整合中优化产业结构,在推进“品质革命”和“绿色制造”转向中促进质量变革,在培育“工匠精神”和“技术创新”融合中实现动力变革,在健全“政策支持”和“社保兜底”举措中增强转型发展定力,有序推进四川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密集度;高质量发展;四川省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1.05.018

收稿日期:2021-06-0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多规合一’机制协调与融合研究”(15XJY003)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徐万刚,男,四川渠县人,经济学博士,四川省发展与改革研究所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产业经济,E-mail:306364717@qq.com。

一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家提升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振兴实体经济的关键领域。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十四五”时期要“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①。在发达国家高端制造“回流”与中低收入国家低端制造“流入”的“双向挤压”背景下,为有效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增强高品质商品供给,提升产业技术含量,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不可回避的时代诉求。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经济从数量时代向质量时代的转型,本质上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的有机统一^②。推进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重要内容^③。以先进制造业为引领的高质量转型方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马珩等提出“制造业高级化”的概念,从制造业结构优度和价值链高度两个维度构建制造业的高级化指数^④;赵福全等以工业 4.0 为背景,提出走智能制造的升级路径^⑤;干勇等从产业链建设的角度,呼吁加强工业基础和材料产业上下游链条的联动,促进制造业的高

^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日报》2020 年 11 月 4 日,第 1 版。

^②邱艳娟《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解读》,《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5 期,第 58 页。

^③刘世锦《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中国发展观察》2017 年第 21 期,第 5 页。

^④马珩、李东《长三角制造业高级化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科学学研究》2012 年第 10 期,第 1510 页。

^⑤赵福全、刘宗巍《工业 4.0 浪潮下中国制造业转型策略研究》,《中国科技论坛》2016 年第 1 期,第 58—62 页。

质量发展^①。也有学者主张通过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区域价值链融合发展,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优化制造业供给质量^②。同时,在新发展阶段,围绕新发展理念,部分学者也作出了尝试性的探索。熊璞等从制度建设层面,提出逐步完善科技创新内生动力机制,打造创新生态体系,推进科技创新融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全过程^③;江小国等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标的角度,提出以五大新发展理念构建制造业高质量转型升级指标体系,推动制造业对标发展,全面提升发展质量^④;徐银娜等提出走工业企业生产、创新、环保系统耦合协调的途径,加快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转型步伐^⑤。可以看出,以先进制造业打造和数据化、智能化改造的两条路径已成为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模式。

从制造行业细分角度看,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转移和高质量转型两个方面。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方面,现有研究主要涉及国际国内两条转移路径。一是立足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对外贸易的需求,提出走国外转移之路。部分学者主张将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向非洲、东南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从非洲工资水平和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林毅夫认为非洲是中国转移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最佳选择,有利于中非双赢^⑥;叶琪等基于反梯度和跨梯度转移趋势,认为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会向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或不发达的非洲国家转移^⑦;也有学者从贸易便利的角度,提出通过经贸合作载体建设,推进我国制造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⑧。二是从区域协调的角度,提出促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从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有序转移。汪斌等强调要充分考虑中西部不同区域分工程度及不同生产阶段要素密集程度,鼓励东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及一些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推动区域经济与区域城镇化协调发展^⑨;吴三忙等从空间结构优化的角度,提出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中西部和北部欠发达地区转移,或者向省内差距较大地方转移的实施路径^⑩。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高质量转型方面,已有研究基本延续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方法和路径。一是主张加快信息技术与较高附加值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融合演化进程,提出大力发展战略含量高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⑪;也有学者提出依托互联网和大数据产业链,加快推进智能制造、融合创新发展,促进制造业向技术层次高端、价值链高端的方向跃升^⑫。二是从品牌建设的角度,提出走自主品牌培育之路,提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力。刘清等认为要通过国际分工与品牌建设相结合的途径,打造国际品牌的劳动密集型全球生产和加工基地^⑬。三是从创新驱动的角度,提出培育高端制造业。叶琪等主张通过科技创新、逆向技术溢出和科研成果转化等途径,推动制造业产品技术的绿色转型^⑭。

^①干勇等《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战略研究》,《中国工程科学》2021年第3期,第5页。

^②参见:黄先海、诸竹君《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与路径选择》,《改革》2021年第6期,第25页;刘奕辰、栾维新、万述林《制造业服务化是否匹配制造业生产效率——基于联立方程的多重中介效应实证》,《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第56—71页。

^③参见:熊璞、李超民《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促进还是阻碍?》,《金融与经济》2020年第1期,第58—64页;董文良、邓珊、王心磊《创新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研究》,《中国商论》2020年第24期,第172—173页。

^④参见:江小国、何建波、方蕾《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区域差异与提升路径》,《上海经济研究》2019年第7期,第70—78页;罗序斌、黄亮《中国制造业高质量转型升级水平测度与省际比较——基于“四化”并进视角》,《经济问题》2020年第12期,第43—52页。

^⑤徐银娜、赵国浩《工业企业生产效率、创新效率与生态效率——基于耦合协调视角的研究》,《统计学报》2020年第5期,第13—24页。

^⑥林毅夫《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下一站应转向非洲》,光明网,2014年7月7日发布,2020年6月5日访问,http://theory.gmw.cn/2014-07/07/content_11862114.htm。

^⑦叶琪、黄茂兴《全球制造业转移及其对国际竞争格局变动的影响》,《经济研究参考》2018年第51期,第66页。

^⑧杨宁《中国制造业国际转移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视角》,《对外经贸实务》2017年第5期,第20页。

^⑨参见:汪斌、岳甚先《新型国际分工下的“世界工厂”与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战略定位》,《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2期,第184页;李娅《国际产业链分工模式的延伸——我国东西部产业转移模式探讨》,《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140—146页。

^⑩参见:吴三忙、李善同《中国制造业空间分布分析》,《中国软科学》2010年第6期,第131页;洪俊杰、刘志强、黄薇《区域振兴战略与中国工业空间结构变动——对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14年第8期,第38页。

^⑪周铁昆、张耀辉《我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政策的研究观点综述》,《经济纵横》2006年第6期,第69页。

^⑫参见:王一晨《运用工业互联网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州学刊》2019年第4期,第30页;熊勋、郑慧娴《创新要素协同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效率的影响——基于品牌竞争力视角》,《工业技术经济》2020年第3期,第22页。

^⑬刘清、王永县《新型国际分工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品牌发展规律研究》,《商业时代》2008年第34期,第92页。

^⑭参见:叶琪、连坤《创新系统驱动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机理与实证——以福建省为例》,《上海商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第32页;宋林、张杨《创新驱动下制造业的产业转型升级》,《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46页。

已有文献分析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研究基础。但对于一个有着多类型、多梯度、多链条的制造业体系而言,如何科学、有序、分层地推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高质量转型发展尚未形成系统的、可操作的路径,尤其对于西部人口和制造业大省——四川而言,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对接和有序转型上仍有很大的探索空间。本文在深入剖析四川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内部构成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提质增效发展路径进行研究,以期助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进程。

二 四川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现状

四川既是人口大省,也是制造业大省,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加快推进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探索,对同类型地区相同发展阶段的制造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有序演化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一)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范围界定

囿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国内学术界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标准认定未达成一致意见,尚存多元化的争论^①。本文立足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②,以“劳动人数/固定资本”为核定标准,根据国家统计行业分类标准对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纺织业、家具制造业、医药化工制造业等 30 个制造业进行比较分析^③。

1. 设定劳动密集度的衡量标准。根据四川统计年鉴数据,对 2006—2019 年制造业每年度“单位固定资本”吸纳“社会劳动力”的平均密集程度进行核算,并将其作为劳动密集度的衡量标准:

$$A_i = \sum_{j=1}^{30} L_{ij} / \sum_{j=1}^{30} C_{ij}$$

其中, A_i 为年度制造业单位固定资本(每亿元)所吸纳的平均劳动力人数; C_i 为年度制造业的固定资本; L_i 为年度制造业的劳动人数。

2. 计算各相关年度的劳动密集度。分别计算该年度各类制造业单位固定资本所吸纳的社会劳动力人数,并将其与当年制造业“单位固定资本吸纳社会劳动力”的平均比值进行比较,计算得出该类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度:

$$MLCR_{ij} = (L_{ij} / C_{ij}) / A_i$$

其中, $MLCR_{ij}$ 为 i 年度 j 类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度; L_{ij} / C_{ij} 为 i 年度 j 类制造业的单位固定资本吸纳的劳动力人数,也可表述为 A_{ij} 。

3. 细划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范围。依据计算数据,划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范围。当单位固定资产匹配的劳动力高于平均劳动力需求配置,即劳动密集度大于 1 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密集度在 1—2 之间为劳动密集型 I 级制造业;劳动密集度在 2—3 之间为劳动密集型 II 级制造业;劳动密集度在 3 以上则为劳动密集型 III 级制造业。劳动密集度数值越大,劳动吸纳能力越强。

通过数据分析,2016 年四川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有 21 个,占制造业(30 个)的 70%(如表 1 所示)。其中,劳动密集型 I 级制造业 16 个、劳动密集型 II 级制造业 2 个、劳动密集型 III 级制造业 3 个;与东部制造业强省相比,2016 年四川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个数比广东省(13 个)多 8 个,比江苏省(16 个)多 5 个,四川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省特征突出^④。伴随资本有机构成的逐步提升,2019 年四川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个数为 19 个,占制造业的比重较 2016 年下降 6.67%。其中,劳动密集型 I 级制造业个数较 2016 年少 3 个,劳动密

^① 参见:杨剑《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规模与演变轨迹 专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黄桂田教授》,《新经济导刊》2009 年第 7 期,第 54 页;丁平《“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真的丧失了吗》,《经济学家》2013 年第 5 期,第 16 页;王炜、孙蚌珠《劳动力供需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增长的影响分析——基于 1996—2011 年的数据》,《工业技术经济》2014 年第 3 期,第 42 页。

^② 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马克思指出,从物质的形态看,资本的构成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可称为资本的技术构成。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称为资本的有机构成。详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07 页。

^③ 根据国家统计局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在国家 41 个工业行业中,除去采矿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开采辅助活动、其他采矿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以及电力、燃气、水生产和供应业,其余 30 个为制造业。

^④ 以 2016 年江苏省和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统计数据为基础,按照劳动密集度计算公式,得出江苏省和广东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数量分别为 16 个、13 个。

集型Ⅱ级制造业增加至5个,劳动密集型Ⅲ级制造业仅剩1个。

表1 2016年与2019年四川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类型

类别 年份	劳动密集型Ⅰ级制造业 ($1 < \text{MLCR} < 2$)	劳动密集型Ⅱ级制造业 ($2 \leq \text{MLCR} < 3$)	劳动密集型Ⅲ级制造业 ($3 \leq \text{MLCR}$)
2016年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食品制造业,纺织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家具制造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纺织服装、服饰业。
2019年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食品制造业,纺织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家具制造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纺织服装、服饰业,其他制造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二)四川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主要贡献

数据显示,2006—2019年,四川省制造业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仍然是制造业的主要组成部分,支撑地位明显(见表2)。从工业总产值看,2011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工业总产值达到19396.71亿元,占制造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75.90%,达到历史峰值;伴随先进制造业的崛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占制造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有所下降,但2015年仍然保持在65.05%的较高份额。从行业资产看,2011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产达到13056.9亿元,占整个制造业资产比重的73.30%;虽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产占制造业资产的比重逐年回落,但2019年比重仍达到51.59%。从创造的利润总额看,2006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利润总额为159.12亿元,占整个制造业利润的47.98%;2015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利润总额占比上涨25个百分点,虽然2019年利润总额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在1000亿元以上,占整个制造业利润总额比重的43.09%。从创造的税收看,2015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应交增值税达到599.68亿元,是2006年的5.75倍,占制造业应交增值税的比重提升了20个百分点;2011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应交增值税所占制造业应交增值税的比重达到78.24%,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成为制造业的重要纳税主体。

表2 四川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贡献情况①

项 目	年 份	2006	2011	2015	2019
工业总产值	制造业(亿元)	6624.96	25556.96	34934.49	——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亿元)	3858.28	19396.71	22724.36	——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占制造业的比重(%)	58.24	75.90	65.05	——
资产总计	制造业(亿元)	6280.12	17811.78	25848.55	33366.75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亿元)	3454.8	13056.9	15326.68	17213.64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占制造业的比重(%)	55.01	73.30	59.29	51.59
利润总额	制造业(亿元)	331.65	1747.59	1603.12	2495.37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亿元)	159.12	1408.55	1173.74	1075.33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占制造业的比重(%)	47.98	80.60	73.22	43.09
应交增值税	制造业(亿元)	226.69	931.13	899.07	——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亿元)	104.31	728.49	599.68	——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占制造业的比重(%)	46.01	78.24	66.70	——

①表中数据根据相关年份《四川统计年鉴》分析所得。由于《四川统计年鉴(2020)》未列出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和应缴增值税的数值,故表中2019年相关数据缺失。

同时,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劳动就业比重看(见表 3),2006—2011 年四川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平均从业人员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06 年四川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平均从业人员为 118.54 万人,2011 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从业人数为 220.53 万人,达到 13 年来的峰值;2012 年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从业人数有所下降,但 2019 年仍有 153.95 万人的就业吸纳量。从就业人员的占比看,2006—2019 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年平均从业人员占制造业和工业的比重分别为 64.68% 和 52.49%,对稳定四川就业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表 3 四川省 2006—2019 年规模以上行业从业人员人数(单位:万人)

年份 行业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工业	233.53	257.46	297.54	311.38	351.67	380.48	391.44	385.05	374.1	354.47	335.48	318.97	299.18	298.86
制造业	179.83	198.83	231.9	245.4	282.49	308.6	318.38	314.65	305.87	291.88	279.77	268.86	253.44	254.74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118.54	142.55	164.63	156.7	171.08	220.53	202.84	183.88	178.22	203.64	196.12	191.56	148.92	153.95

上述数据表明,囿于产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技术水平的限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仍是四川省制造业的重要支柱。因此,四川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路径必须充分考虑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仍占主体地位的客观事实,从实际出发,综合考量各类影响因素,分层、分类、梯次推进四川省制造业的产业转型和产业转移。

(三)推动四川省传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和成效

针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仍占主体的省情,四川省提出全面实施“中国制造 2025”四川行动计划,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

1.大力引进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十三五”以来,四川省大力实施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工程,引进一批重大产业,着力推动高端装备、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形成一批特色产业链。截至 2020 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营业收入达到 20167 亿元,首次突破 2 万亿元,发展态势优于工业总体水平^①。

2.着力打造一批制造业基地。为推进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四川省着眼产业分工协作和产业链重构,逐步打造以成德眉资、宜宾、南充等为集聚载体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高端装备产业集群、食品饮料产业集群、先进材料产业集群、绿色化工产业集群。其中,四川省成都市软件和信息服务集群,四川省成都市、德阳市高端能源装备集群等进入国家工信部重点培育对象^②。

3.强化标准和品牌建设。全面推进全省质量提升行动和重点工程建设,建立健全四川标准体系,开展“川字号”农产品品牌创建行动。“十三五”期间,泸州老窖等 9 家企业荣获“全国质量标杆”称号,14 项企业标准被评为“领跑者”,创建国家级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 57 个、国家技术创新基地 3 个、国家知名品牌示范区 7 个,现有优势农产品品牌 816 个,郫县豆瓣、蒲江雀舌等 19 个品牌荣登区域品牌百强榜。

4.加快推进绿色化转型。为转变发展方式,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工业化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四川省深入探索“亩均论英雄”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机制。2020 年,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评价中,电子信息产业的亩均营业收入最高,达到 1483.3 万元/亩;食品饮料产业亩均税收最高,达到 23.7 万元/亩;先进材料产业人均营业收入最高,达到 163.8 万元/人^③。

三 四川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困境和压力

尽管四川省传统制造业高质量转型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对于一个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省而言,转型升级任务依然艰巨,不仅要面对国际国内大环境的竞争博弈,而且也面临转型进程中的各种风险和成本压力。

(一)国际环境下的多重挤压

^①《我省去年高新技术产业营收超 2 万亿元》,《四川经济日报》2021 年 3 月 4 日,第 1 版。

^②张宇《四川“亩均论英雄”结果公布,2131 家企业上榜 A 类!》,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2021 年 3 月 9 日发布,2021 年 6 月 5 日访问,<http://www.cnic.org.cn/xy/sc/1050759.html>。

^③单鹏《四川探索“亩均论英雄”: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国新闻网,2021 年 3 月 8 日发布,2021 年 6 月 5 日访问,<https://www.chinanews.com/cj/2021/03-08/9427759.shtml>。

伴随国内制造业综合成本的持续攀升,以劳动力总量和成本为核心的传统比较优势面临东南亚地区低成本竞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碾压和中美贸易冲突叠加的“三重挤压”,资本外流、产业转移和技术封锁对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开放发展极为不利。相关研究数据显示,我国中西部地区单位劳动力成本普遍偏低,单位劳动力成本是泰国的 95% 和菲律宾的 84%^①;但与老挝、柬埔寨、缅甸、越南等地区相比,劳动力成本优势并不明显,2010 年我国小时工资已是越南的 2 倍左右^②;同时,东南亚地区较低的关税或零关税诱惑等对我国制造业也形成不小的冲击。此外,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力图通过各种贸易保护措施、“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等非关税壁垒强化贸易摩擦,恶化我国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贸易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力图遏制我国制造业的崛起;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发达国家为弥补和完善各自区域化的完整产业链,有加快重塑“去中国化”的进程^③。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也将加速更多国外订单企业向非贸易战地区(如东南亚等地)迁移,不利于四川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二)结构调整下的边缘风险

在产业技术不断更新、资本投入不断累积的效应下,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呈现出“一二三”→“二三一”→“三二一”的演化发展历程。2013 年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提高到 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④,标志着我国产业结构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19 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 53.9%,高于第二产业占比近 15 个百分点。2016 年四川省第三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9 年第三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52.44%,高于第二产业 15.19 个百分点,与全国较为接近^⑤。这种“三二一”产业结构的形成,虽然是现代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趋势性特征,但由此形成的考核导向,容易导致地方政府的关注重点发生偏移,工业地位逐步降低,制造业支撑作用逐步弱化,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被逐步边缘化的风险与日俱增。

(三)转型进程中的成本加大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制造业长期赖以生存的“低成本优势”正逐步消失。一是要素成本压力逐渐加大。伴随劳动力工资上涨、保费支出和生存成本增加等综合因素影响,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在供求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环保整治的叠加影响下,西部地区制造业原料、土地、物流、融资等要素成本增加,企业成本上涨压力增大,企业利润空间不断压缩。以工业地价为例,2015 年四川省成都市工业地价为 726 元/平方米,2018 年上涨至 843 元/平方米,年均增速为 5.11%,不断推高制造业的生产成本^⑥。“融资难、融资贵”现象依然存在,根据 2017 年四川省民营办调查数据,企业实际资金成本高出贷款利率近一倍,持续保持在 10% 以上,部分地方(如凉山州)甚至高达 20% 以上。二是“机器换人”行动成本压力较大。“机器换人”是产业资本化、技术化的重要途径,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必然选择。但“机器换人”对企业投资而言,尤其对于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的中小企业,在投资成本和维护成本上都形成了较大的成本压力。以电脑织机为例,按照目前每台(国产)价格 5 万元计算,500 台电脑织机上线,最低投资 2500 万元以上;同时还需新增电脑编程员岗位,工资支出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从投资风险看,“机器换人”投资回收期限较长且存在订单不足、产能闲置等市场风险,从而也加重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主动转型的担忧和疑虑^⑦。

(四)环保督查下的整改压力

四川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多为生产水平低下、环评要件不齐、环保设施不足、治理简单粗放的中小微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该类企业面临调存量、控增量、减总量和生态环境保护大趋势下的限产、

^① 何律琴、徐竞阳《论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基于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国际比较》,《中国集体经济》2016 年第 33 期,第 22 页。

^② 魏浩、郭也《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及其国际比较研究》,《统计研究》2013 年第 8 期,第 108 页。

^③ 侯润芳《全国政协常委葛红林:警惕疫后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新京报网,2020 年 4 月 2 日发布,2021 年 6 月 5 日访问,<http://www.bjnews.com.cn/finance/2020/04/02/712385.html>。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2014 年 2 月 24 日发布,2021 年 6 月 5 日访问,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2/t20140224_514970.html。

^⑤ 根据相关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和《四川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

^⑥ 根据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历年城市地价动态监测数据整理。

^⑦ 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课题组《“机器换人”对台州制造业的影响》,《浙江经济》2016 年第 24 期,第 40 页。

停产或淘汰。在资源匮乏和环境承载能力不断恶化的状况下,该类企业还将面临整改、关停、转移、升级或重组的压力。以纺织、皮革、服装、造纸、印刷、橡塑、废弃资源利用及食品加工等为典型代表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属于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极易对环境造成较大污染,对资源依赖和环境敏感性极高。从环保技改的投入看,一个年销售收入 500 万元以下的小企业,如果按照国家标准处理废水废气,基础设施投资约为 100—300 万元,加上日常运行费用(总产值的 1%—3%),已远超一般小企业几十到几百万元的投资总额^①。

四 四川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在新技术浪潮推动下,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成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推进四川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既要在有序“承接转移”和“空间布局”整合中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规模集聚效益;又要在推进“品质革命”和“绿色制造”转向中促进质量变革,提升综合竞争力;同时更需要在培育“工匠精神”和“技术创新”融合中实现动力变革,转变发展方式。

(一) 优化空间结构,有序推进产业集聚集约发展

基于不同行业属性和劳动密集度差异,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型路径不宜简单、片面地追求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发展路径,应在充分考量劳动力资源禀赋和城市化就业等发展需求基础上,推进关联产业的优选承接,促进集聚集约发展。

1. 加强产业对接,有序推进承接转移进程。首先,积极对接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项目。通过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相同行业的比对,科学推进与东部地区上下游关联产业链的承接,逐步形成东西互动、互为补充、产业链条完备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业体系。如四川、广东、江苏等省均有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家具制造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可围绕相同产业的上下游链条促进产业链的承接和转移。四川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范围之内的农副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等,适宜从广东和江苏等省直接引进,强化产业对接的有的放矢。其次,推进省域范围内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合理转移。强化成都、德阳、绵阳、宜宾等向周边区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定向转移力度,围绕交通轴线,科学打造产业承接发展带,带动产业基础薄弱区县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

2. 优化空间布局,促进关联产业集群发展。首先,强化省域四大城市群产业集聚效应。从提升成都平原经济区、川南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和攀西经济区城市群集聚效应和保障充分就业的角度,审慎推进劳动密集型Ⅱ级和Ⅲ级制造业的智能化改造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深化进程,从延链、补链、强链等角度着力打造仪器仪表制造业、家具制造业及文教、工美、体育娱乐用品制造业等产业集群,促进该类制造业的整合发展,提升城市群劳动人口吸纳能力,确保在稳定就业和提升效益上实现双赢。其次,大力推动人口大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集聚集约发展。从劳动力资源禀赋和城镇化率提升的角度,宜在安岳、仁寿、简阳等百万人口大县(市)及人口富集特色乡镇等区域积极引进和促进劳动吸纳能力高和综合效益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链式集聚发展,夯实县域经济发展基础。第三,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转型优化发展。以各市(州)县经济开发区、技术园区、高新区和飞地合作园区等为载体,围绕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联动配套推进劳动密集型Ⅰ级制造业的技改投资,促进关联产业的资本化进程。

(二) 强化质量变革,全面提升产业综合竞争能力

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高端产品有效供给不足的背景下,四川省应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开展品质革命和绿色制造行动,大幅提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1. 强化质量品牌建设。首先,提升产品供给质量。四川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应全方位对标国际先进质量标准,大力实施质量升级工程,积极引入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质量管理技术,着力提升轻工、纺织、家电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的质量、档次和技术含量^②。其次,强化品牌意识。品牌是制造业综合实力的集中反映,是制造强国的核心竞争力^③。四川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品牌建设,应以特色制造业为引领,推进劳动

^① 王海慧、王宗林《环保整治对江苏化工行业的影响分析》,《金融纵横》2017 年第 10 期,第 63 页。

^② 李金华《新工业革命进程中中国先进制造业的格局与调整路径》,《学术论坛》2018 年第 2 期,第 84 页。

^③ 辜胜阻《辜胜阻:六大举措做强品牌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搜狐网,2018 年 12 月 26 日发布,2021 年 6 月 5 日访问,https://www.sohu.com/a/284557259_114731

密集型Ⅰ、Ⅱ级制造业中的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等特色制造业实施品牌多元化、系列化发展战略,激活企业品牌创建、经营和管理的内生动力,通过区域品牌、行业品牌和品牌企业创建,提升自主品牌发展能力,实现从“贴牌”生产向自主品牌的转变,打造若干具有引领示范价值的知名品牌^①。

2.促进绿色制造转型。在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下,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生态工业,促进绿色加工转型成为破解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高能耗、高污染、低水平”瓶颈制约,推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四川省可充分发挥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农副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产业优势,深入实施绿色制造工程,加快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建设,积极推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绿色改造,重点推广低污染低排放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绿色化。加强绿色科技创新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广泛应用,大力实施统筹节能、降耗减排、综合治污的集成化、系统化实用技术,促进绿色产能增长对边际产能的替代,不断提升绿色产品供给质量。要着力推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绿色制造与生态文明的有机融合,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

(三)转变发展方式,培育打造产业持续发展动力

四川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型发展,既离不开现代技术的改造与融合,也离不开“工匠精神”的全面植入。现代技术的改造与融合能够提高劳动密集度较低的制造业资本的有机构成,加速行业的资本化和技术化进程;“工匠精神”的全面植入,能够有效提升劳动密集度较高的制造业技术队伍的综合素质和企业创新力,为产业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智力支撑。

1.加强现代技术的融合与改造。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②。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型发展应根据劳动吸纳强度分类推进。首先,宜加快劳动吸纳能力较弱的劳动密集型Ⅰ级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速推进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制造业的技术改造进程,深化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程度。其次,劳动密集型Ⅱ、Ⅲ级制造业宜通过国际对标,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该类劳动密集型制造环节实现上、下游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在稳定劳动就业基础上,逐步推进劳动力、机器和资源的智能互联,实现研发模式、产品形态、商业模式等数字化转型。再次,促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创新,持续推进制造技术的改进创新与服务模式创新的融合发展,引导和支持制造业从产品供给向“产品+服务”转变,实现制造业向服务化方向的成功转型^③。

2.全面提升企业主体综合素质。以企业和工人队伍为核心的供给主体是制造业转型发展的能动载体,是推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动力变革的核心要素^④。首先,加强“工匠精神”的全面培育。习近平指出,“工业强国都是技师技工的大国,我们要有很强的技术工人队伍”^⑤。锻造一支知识深厚、技能精湛和善于创新的高素质技工队伍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围绕工业强省战略,积极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或技术领军人才,探索地方特色学徒制,大力推进技工型人才培养,提升技术工人操作技能、质量水平、责任意识和创新能力,激发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观能动性,弘扬工匠精神,培育大国工匠^⑥。其次,厚植“企业家精神”环境。重视企业家队伍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家敢打敢拼、敢闯敢试、追求卓越的变革精神,着力构建企业家创新创业激励机制,围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家“红黑榜”制度,在政府采购、融资担保和工程招投标等方面给予相应的奖励或惩戒,强化优秀企业家精神展示,强化营商环境建设,凝聚崇尚创新创业正能量。

五 结论及建议

^①丁文珺、杜志明《我国制造业发展四十年:成就、新形势与转型思路》,《经济纵横》2018年第8期,第77页。

^②郭晗《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第21页。

^③何华武《我国制造业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和对策》,《中国科技产业》2018年第8期,第18页。

^④任保平《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和重点》,《红旗文稿》2018年第24期,第22页。

^⑤郝洪《点亮技师技工的职业荣光》,《人民日报》2017年6月9日,第5版。

^⑥刘伟丽《政府、企业与个人齐心协力 大力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人民日报》2017年4月25日,第7版。

通过对 2006—2019 年四川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从基本省情看,四川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省特征突出,劳动密集型 I、II 级制造业占比仍然较大,转型升级的任务艰巨。(2)从转型思路看,四川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型发展应摒弃“一刀切”的片面模式,宜根据资源禀赋和劳动密集度,分层、分类、有序推进不同类别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型发展。(3)从发展路径看,四川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围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等发展要求,结合产业实际,探索适合区域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特色路径,全面提升制造业的综合竞争力。

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之际,四川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也亟需健全相关体制机制,强化政策保障,增强产业转型发展的定力。(1)完善转型发展支持政策。制定有利于推进四川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的具体措施,建立健全科技创新、新技术运用、绿色生产等领域发展的技术转移转化、税收优惠、要素支撑等综合服务体系。(2)构建产业转型的链长制。借鉴东部发达地区省市领导全面负责的产业转型发展模式,深入剖析重点产业链条优劣势,制定产业链式图、技术发展路线图、区域格局分布图,着力构建“一链一制、一链一策”的精准转型机制,培育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链。(3)强化人才要素保障。深入推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培育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队伍,造就一批高素质的专业领军人才;强化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培育一批实用型的技术工人队伍,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和劳动技能人才支持。(4)增强社会保障兜底功能。积极推进非全日制就业、阶段性就业、远程就业或临时短工等灵活就业模式,有效应对制造业转型进程中失业人员队伍的再就业需求;建立健全技能人才“失业—培训—再就业—人才流动—创业”良性循环的社会保障机制,构建技能劳动者人尽其才的良好发展环境。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Sichuan Province: Based on Data from 2006 to 2019

XU Wan-gang

(Sichuan Provinci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hengdu, Sichuan 610021, China)

Abstract: With new technology revolution, the direction of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become an urgent issue in the academic field. With relevant data of Sichua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rom 2006 to 2019,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scientific classification and hierarchical promo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 starting from the dilemma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Sichuan province.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Sichuan province can be realized by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integrating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spatial layout, by promoting the quality change in transferring quality revolution and green manufacturing, by realizing the dynamic change in reconciling craftsman spiri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by improving the policy support and social security measures.

Key words: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labor intensity;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Sichuan province

[责任编辑:钟秋波]